

《花影月梦》序

《明清代歌研究》后记（摘要）

《人生喜剧与悲剧人生》序

《南京清凉山》后记（摘要）

《张岱探稿》序

《辜鸿铭传》序

《西山论道集》自述（摘要）

《八股文史》后记（摘要）

《凌濛初研究》序

清凉问学

王廷信 孔庆茂◎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清凉问学

王廷信 孔庆茂 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凉问学 / 王廷信, 孔庆茂主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641-4081-6

I. ①清… II. ①王… ②孔… III. ①陈美林—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9118 号

清凉问学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4081-6
定 价 65.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 025-83791830。

前 言

十二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陈美林先生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位十分健谈、和蔼可亲且又富有幽默感的学者。当时先生年近七旬,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也已接近五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博士后出站,离开南师大到东南大学工作,也有十年时间了。

2010年起,同门的师兄弟、师姐妹协商为陈先生做一个八十华诞的纪念活动,由陈先生在南京的部分弟子牵头,其中主要有现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任职的李忠明教授、现在南京农业大学任职的杨旺生教授、现在南京艺术学院任职的孔庆茂教授以及我本人。我们一道为这次活动做了一些牵线搭桥和组织工作。2011年4月,这项活动如期举行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曾在陈先生门下求学的学子们济济一堂,与陈先生一道畅谈。那份热烈的情感和令人激动的场面至今仍犹在眼前。

陈先生常说,师生一场是一种缘分。能够在芸芸众生中让数十位曾经并无任何瓜葛的年轻人先后在同一位导师门下讨论学问,这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也正是在这种缘分牵引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在谈学论道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

在我的一生中,遇见过许多值得敬佩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成长都有过激励和帮助,陈美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除了在学业上向陈先生请教之外,也常与陈先生一道参加学术会议、喝茶、散步、聊天。让我最感动的是陈先生每次都会主动为我们几位同学提供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外边一有重要学术研讨会,陈先生都会给会议主办方打招呼,商请主办方邀请我们这些弟子参加,也让我们长了见识。在南师期间,我先后参加过多次会议,都与陈先生的帮助密切相关。

陈先生是一位执著的学者。长期以来,他在《儒林外史》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儒林外史》版本的校订与注释,到其作者家世的考证与研究,从该作的艺术特征到内容分析。可以说,凡是与《儒林外史》相关的大小问题他都密切关注、潜心研究。因此,先生有关《儒林外史》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也被大家普遍认可。

陈先生常说,做学问要把精专与广博结合起来。他自己也是这样践行的。因此,除了《儒林外史》以及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之外,陈先生的学问还涉猎古代诗文,甚至延伸到对文化问题的关注。陈先生至今出版了四十余种专著,发表三百余篇学术论文,涉及诗文和文化问题的论文也不算少。自20世纪90年代起,

陈先生开始探讨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自2001年起,陈先生开始探讨物质文明、人文科学和中国古代人精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陈先生在精专基础上对宏大文化问题的灼见。

年届七十,陈先生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令人吃惊的是,陈先生退休之后不到十年之间,也发表了近七十篇学术文章。这实在令人震撼。我们单从先生退休之后发表文章的数量,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学术的热爱与执著。

作为一位师长,除了言传身教之外,陈先生对于后进的一贯奖掖也令人难以忘怀。从为弟子们提供各种学术研究的机会,乃至为弟子们求职提供无私帮助,到为弟子们的专著撰写序言,都可以看出陈先生作为一位师长的美德。自20世纪90年代起,陈先生门下的弟子们也开始陆续出版专著了。每有弟子提请陈先生写序,先生都会爽快答应,认真撰写。本文集收集了陈先生为弟子们和年轻的朋友们撰写的序言约20篇,从这些序言不难看出陈先生对于弟子们和青年学者的关心和爱护。

本文集是弟子们为纪念陈先生八十华诞而编辑的一部文集。文集以“清凉问学”取名,乃因陈先生家住清凉山下。清凉山位于南师附近,有“七朝胜迹”之称,虽然不算高大,但也是陈先生半生钟爱的一片清净之处。数十年来,陈先生每有闲暇,都会在这里散步,时有弟子相伴。陈先生一生为学,少问世事。学问的清凉与山名相映,让人感受到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陈先生曾出版《清凉文集》,他在该文集的《跋》语中言,清凉山“在平时,却是一片静寂,可以听松涛,可以闻杜鹃,可以步月林下,可以赏雪楼上,此实足以发人深思、启人心智”。旧时清凉山有一楹联云“大地何须热,名山自清凉”。陈先生有感于此,云“读书作文,只能‘凉’作,不宜‘热’炒”。这简短的感言既道出了陈先生为学的基本风格,又可对弟子们寄予警示。因此,以“清凉问学”命名本文集,将有助于弟子们继承陈先生的为学精神。

本文集除了收集陈先生为弟子们和青年学人的著作撰写的序言以及大家已出版专著的后记外,还收集了针对陈先生的三篇访谈以及李忠明教授、宋伦先生撰写的有关陈先生治学的两篇研究文章,同时还收集了先生自己撰写的《从事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此外,文集还收录了2011年4月陈先生门下弟子在纪念陈先生八十华诞之日与陈先生一道畅叙的纪要。文集聚焦于陈美林先生及其弟子的学问之事,对于大家了解陈门师生的问学之路当有裨益,同时也希望对大家研究和思考数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教育有所启发。

转眼之间,自己也已进入知命之年了,先生年事已高更是自不待言。我们衷心祝愿陈先生暨师母李伯英女士身体健康、晚年幸福!也恳望读者们对本文集批评指正。

王廷信

2012年深秋于梅庵

目 录

前言/王廷信	1
陈美林先生的学术道路及其贡献/李忠明	1
萋兮斐兮 成此贝锦/王廷信	
——陈美林教授访谈录	14
戏曲教学、创作与研究/王廷信	
——陈美林教授访谈录	28
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与陈美林先生访谈录/朴桂花整理 李淑宁翻译	45
陈美林和《儒林外史》研究/宋 伦	49
从事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回顾与思考/陈美林	51
《辜鸿铭传》序/陈美林	63
《辜鸿铭传》后记(摘要)/孔庆茂	69
《凌濛初研究》序/陈美林	71
《凌濛初研究》前言(摘要)/徐定宝	72
《报刊·市场·小说》序/陈美林	74
《报刊·市场·小说》后记/方晓红	76
《花影月梦》序/陈美林	78
《花影月梦》后记/顾晓宇	80
《市民、士人与故事》序/陈美林	82
《“儒林”探微》序言/陈美林	84
《“儒林”探微》后记/吴 波	86
《〈歧路灯〉研究》序/陈美林	87
《〈歧路灯〉研究》后记/李延年	88
《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序/陈美林	90
《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后记/吴秀华	93
《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序/陈美林	94
《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后记(摘要)/胡金望	99
《〈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序/陈美林	101
《〈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后记(摘要)/吴 波	106

《明代民歌研究》序/陈美林	108
《明代民歌研究》后记(摘要)/周玉波	113
重视对“剪灯”系列小说研究——《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序/陈美林	117
《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后记(摘要)/乔光辉	124
《张岱探稿》序/陈美林	126
《张岱探稿》后记/张则桐	135
《日人禹域旅游诗注》序/陈美林	137
《日人禹域旅游诗注》后记(摘要)/孙东临	139
《施耐庵与《水浒》》序/陈美林	141
《施耐庵与《水浒》》后记(摘要)/黄倬成	143
《明清小说研究》序/陈美林	146
《明清小说研究》后记(摘要)/张虹	148
《明代南京学术人物传》序/陈美林	149
《明代南京学术人物传》后记(摘要)/沈新林	154
《〈阅微草堂笔记〉与传统文化散论》序/陈美林	156
《南京清凉山》序言/陈美林	160
《南京清凉山》后记(摘要)/苏克勤	165
《文人置业那些事》序/陈美林	167
《文人置业那些事》后记(摘要)/黄强	173
《明清小说的演进轨迹》后记(摘要)/臧子厚	175
《〈春秋〉经传研究》后记(摘要)/赵生群	176
《夏敬渠与《野叟曝言》研究》后记(摘要)/杨旺生	177
《台阁体研究》前言(摘要)/陈传席	178
《西山论道集》自述(摘要)/陈传席	180
《陈传席文集》自序(摘要)/陈传席	182
《八股文史》后记(摘要)/孔庆茂	183
《走进中国经典传说与小说的世界》序/陈美林	185
“全国艺术教育暨庆贺陈美林教授八十寿诞学术研讨会”纪要/武翠娟整理 王廷信修订	188
附录 A 陈美林先生著述目录/陈美林整理	217
附录 B 陈美林先生门下弟子简介/孔庆茂整理	232

陈美林先生的学术道路及其贡献

李忠明

陈美林先生(1932—)，江苏省南京市人，回族，著名文史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等学术著作四十余种，发表《论杜诗的形象思维》、《稿本〈秣陵秋〉传奇作者和创作时代考辨》、《古籍校勘与古代文学作品解读》、《试论儒学对文学之影响》等论文三百余篇，其成果曾获得首届国家教育部(时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愚1988年9月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拜在先生门下，连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4年毕业留校工作，至2008年调离南京师范大学，追随先生达二十年之久。惜愚驽钝，于先生学问之境界，未能窥其一二。今欣逢先生八十华诞，故不揣鄙陋，略述所知，为先生寿。

一、先生的学术道路

南京一中是一所百年名校，在南京乃至全国都有地位。新中国成立前，一些名师大家都曾在此兼课，如唐圭璋先生。每周一上午的周会，学校都请著名学人来此讲演，如卢前(冀野)等人。先生在一中读书六年(初中、高中)，虽未曾直接受教于唐圭璋先生，但卢冀野先生的讲演却是听过的。卢先生演讲时说一中校园(府西街)曾是南唐宫廷之地，附近的“内桥”(桥名至今未变)即为大内之桥，由南唐宫廷而讲及二主词作，激起少年时代的先生热爱诗词的兴趣。同时，先生曾在一些报纸副刊上零星发表一些新诗、散文，就怀着当一个文学家的梦想，于1950年在华东地区几所国立大学(中央大学当时已改名为南京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联合招生中报考了浙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先生一直向往去湖畔诗人生活之地学习，有幸被录取，于1950年8月下旬去浙大报到，9月2日接受系主任郑奠教授及几位老师包括夏承焘先生在内的“面试”(《天风阁学词日记》有记载)。当时浙江大学中文系老师中名家颇多，如郑奠先生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即留校任教，后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一度与鲁迅先生同事，为著名的修辞学家。1945年起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夏瞿禅先生为著名词学大家，沙孟海先生为杰出的书法名家，王焕镛(驾吾)先生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东南大学，师从柳翼谋(诒徵)、王伯沆、吴梅等名家(《吴梅日记》卷十二记云

“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行后世，得此亦足以自豪”，曾编纂《首都志》等多种谱志，以及研究韩非子、墨子的著作多部。孙席珍先生是著名作家，早年创作有诗歌、散文、小说多种，鲁迅在《诗歌之敌》文中称他为“诗孩”。埃德加·斯诺曾在《活的中国》一书中为之写有《孙席珍小传》，曾为北方左联领导人之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起在北京女师大讲授西洋文学史，出版过《辛克莱评传》、《莫泊桑生活》、《英国文学研究》、《欧洲文学史》、《近代文艺思潮》等多种著作。1951年秋，孙席珍先生应浙江大学之聘，主讲西洋文学，同时开设现代诗歌课程。王西彦先生为著名作家，曾参加北方左联，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授，1951年春应聘来浙江大学任教，后赴上海作协为专业作家兼任华东师大教授，出版小说创作如《古屋》、《神的失落》等多种，以及文艺评论著作如《挽歌与赞歌》等。先生就读于浙大时，当年招收新生15名，至毕业时仅有6人，因而师生易于交融，受到的熏染也就多多。尤其是师生先后赴浙江嘉兴参观土改、去安徽五河参加土改，生活在一起，老师对学生的了解深入，而学生也可直接从老师处学得如何为人治学。在沙孟海先生《日记写本两种》和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多处提及先生名讳。直到“文革”期间，夏先生还写信给词友唐圭璋先生寻找先生下落，从此先生又恢复了与夏承焘、王驾吾、沙孟海、陆维钊、孙席珍、王西彦等先生的联系。“文革”结束之初70年代后期王西彦先生曾来游南京，并带领先生去他的老友陈白尘先生家访问。1981年先生被邀去杭州大学讲学，又拜访了王驾吾等老师。诸位老师先后去世后，先生还陆续发表了回忆夏承焘、沙孟海、王驾吾等先生的文章。上世纪70年代时，唐圭璋先生曾在一份学术鉴定书中说“我校陈美林教师早年受业于王驾吾、夏瞿禅两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已打下深厚的基础”。可见，浙江大学的学习经历，对先生的学术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先生曾言，读大学时仍一心想搞创作，与孙席珍老师、王西彦老师也有较多的接触，接受他们的教诲和指导，曾任学生组织浙大文艺社负责人，学校经常举行各种晚会如五四晚会等，会上照例有朗诵诗的节目，而诗作经常出自先生之手。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先生时任浙江省文联负责人，也在浙大兼职，而郑奠先生也为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在1951年暑假曾组织浙大中文学系3位学生去余姚庵东盐区体验生活，以创作反映盐民生活的作品，先生为3人之一，但因听不懂当地方言，无功而返。根据政务院命令，是届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以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先生便于1953年秋被分配当教师，未能从事专业创作，当时虽有零星诗文发表，但屡经工作变动和迭遭运动，目前可以寻找到的仅是在鲁迅逝世廿周年所写的《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一文，发表于《浙江日报》1956年10月21日，署名东阜。

由于担任教职，先生开始由文学创作转向文学研究。1958年，先生调往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该校改名为苏州大学）参加重建中文系的工作，由学院任命钱仲联先生和先生分别担任古代文学教研组的正副组长，当年钱先生是五十余岁的

老教师，而先生则为甘余的青年教师。钱先生表明自己不搞小说、戏曲，要先生承担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不能拒绝。但因提早一年毕业，读书时未曾认真学习过元明清文学。既然接受这一任务，先生便边学习边讲授，而学习的主要方式是编讲义。“从1958年秋季起始，用了近两年的时间编写了超过百万字的讲义讲稿。1960年代初，学校办了一个自编教材的展览会，有关部门选中了我所编写的戏曲教材参加展出。《光明日报》1961年3月22日还在头版头条以《江苏师院积极培养红专师资队伍》为题作了报道”（陈美林《戏曲研究与戏曲改写的回顾与思考》，东南大学学报，2008年3期）。先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弥补了当年读书时未曾下过工夫的元明清文学（包括戏曲、小说、诗文等）。同时，由于钱仲联先生被抽调去上海参加郭绍虞先生组织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编选工作，他所留下的宋以前的文学由先生和另一位同事承担。因此，先生在苏州工作期间不仅讲授元明清文学，也讲授唐宋文学。这种学习和教学经历，为先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和相对广阔的领域。

二、先生的学术特点

综观先生五十多年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果，可以看出，先生在治学上有明显的个人特点：

首先是将教学与研究统一起来，将工作需要与自选课题结合起来，教学工作为学术研究提出课题，学术研究成果又深化教学工作。如先生对戏曲的研究，是从讲授“苏州派”开始的，钱仲联先生对先生的讲稿非常满意，两次主动向中华书局力荐先生，其推荐信中说先生“专攻古代戏曲，用力至劬”，“擅长古典戏曲，文笔生动流利”，“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较深”，“兼擅新旧之长”，所以中华书局约请先生撰写《李玉与〈清忠谱〉》一书（陈美林《追忆钱仲联先生》，钟山风雨，2008年3期），由此开启了先生的古典戏曲研究之路。即使是先生最为专擅的《儒林外史》研究，也是从工作需要开始的。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整理《儒林外史》并撰写前言。学校成立了四人小组，第一稿“前言”由先生执笔完成（陈美林《〈儒林外史〉前言有四稿》，文史知识，2001年11期）。但初稿完成后，先生即被调出小组（陈美林《我与〈儒林外史〉研究》，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5期），从此开始个人研究，成果累累，为学界所公认。再如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也是始于教学的需要。从自己编纂百万字的讲义（即文学史的雏形），到70年代参加四所和十三所院校编写文学史和作品选读教材工作，承担部分章节的编写，80年代初南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文学通史的编写任务，承担《宋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先生先是被确定为两个专职人员之一（后因避免种种纠纷，坚决辞却），为此发表《重视对文学史著作的研究工作》（南师学报，1980年2期）一文，当时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尚未提出，该文在回顾近百种文学通史、断代史、体裁史以及一些专史的基础上，反思既往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问题。

唐老对此文极为赞赏，日本东洋文献当年著录此文。卢兴基先生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时，关于文学史分期问题、主流问题两个专题，就约请先生撰写。先生还积极参加有关文学史的讨论，包括1961年文学所的三卷本文学史、1978年王季思先生四卷本文学史修订征求意见会等活动。同时，先生还借鉴西洋文学史，发表了《也谈比较文学》（光明日报，1980年10月15日）一文。当时，国内关于比较文学的讨论尚未普遍展开。至于国外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如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和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家盖尔维努斯的《德国民族文学史》、意大利批评家德·桑克蒂思的《意大利文学史》以及丹麦文学史家布兰代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早年也从孙席珍先生讲授时有所了解，孙先生晚年曾写信给先生，借阅先生当年的听课笔记。由于对古今中外文学史进行过广泛涉猎与研究，先生对文学史的撰著有着独特的看法，曾主张不宜多人集体编写文学史，应组织少数观点相似的学者一起编写，并以《〈儒林外史〉研究史》为实践，在自己陆续写成数十篇专文的基础上，指导两位弟子，并与之合作，撰成一部专书的研究史。

仅上述三例，即可说明，先生将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这对当下的年轻学者极富借鉴意义。

其次，将创作、教学、研究视为一体，予以同样重视。先生早年想当作家，惜未能如愿，但也锻炼了文笔，直至近年仍不时有散文、随笔发表，如先生为《清凉文集》所作跋语，为老出版家徐柏容先生所激赏，推荐至《散文》发表（2000年6期）。集中体现先生创作活动的，是他将古代戏曲的代表作品重新创作为中、短篇小说（故事）。这项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起因是当时古代戏曲的大量作品未曾整理出版，讲课时学生未读过作品，难以满足教学需要。先生考虑到李渔的《比目鱼》等作品、孔尚任的《桃花扇》、莎士比亚的剧本，都曾经被改写成小说，有的还成为名著，畅销一时，因此自己动手改写古代戏曲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后结集出版，先后出版《元杂剧故事集》、《明杂剧故事集》、《清杂剧故事集》、《中国戏曲故事集》等。外文出版社将《元杂剧故事集》译成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发行，又约先生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改写成中篇小说，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此三种英文版又由美国纽约一家出版社合编成一册印行。同时，该社还约请先生整理《桃花扇》原作，先生乃以西洋诗剧的形式予以整理，撰写了长篇前言，纳入大中华文库，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先生认为，这种改写，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创作，很有价值，戏曲改写（创作）、戏曲研究和戏曲演出，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做得优劣之别。2007年秋于厦门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上，先生应邀做学术总结，针对当前优秀剧作少的现状，提出从事戏曲研究和戏曲教学的学者，不妨也动手搞点创作。“五四”时期，就有不少教授既能研究、教学，也能创作。在古代一些学者也有能从事创作的，如清代学者程廷祚不但治经有成就，又擅长诗文创作，同时还作有《莲花岛传奇》，袁枚为其作的铭文即云“儒林文苑本无界，谁欬划开成

两界”。先生的总结发言，题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第七届全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刊于《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2期。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应聘为江苏省高校职称评审组成员的同时，偶或也接受与作家评审有关的活动，如1993年与1995年两度被聘为江苏省作家协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参与对一、二级作家的评审（1993年评委会主任为陆文夫，1995年为高晓声），1996年南京大学授予著名作家韩素音为名誉博士，聘请先生为推荐人并撰写推荐意见等。

第三，在宏观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在微观研究中体现宏观。以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为例，在文学史众多的作家作品中，突出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似乎课题不大，但先生能将这一位作家这一部作品的题目进行放大研究，从微观中体现出宏观。如就研究范围而言，从作家研究到作品研究、研究的研究（研究史），全都网罗在内，充分体现了“取材严”而“挖掘深”的特点。以吴敬梓作家研究而言，1984年出版的《吴敬梓研究》收辑了先生1982年以前的论文，仅从题目看，有对其生平、家世的考证，有其先世资料、交游资料的搜辑辨证，有从经学、史学、哲学、戏曲学乃至科学技术角度来探析其思想的形成，涉及作家研究的各方面。程千帆先生对这样的研究曾评价说“对于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正确地叙述其行实，评价其思想及艺术上的成就，阐明其文化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丰富文学的整体研究，是一项相当艰苦而又非常必要的工作”，认为先生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和深入的，有不少方面是前人履齿所未及的，即开拓性的”，“显示了近年我国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成绩”，“此书研究的虽然只有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但显示了陈美林先生在历史、哲学、文学史、文艺理论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和精到见解”。这样的评价，充分显示了先生以宏观的视野，深入微观研究的特色。同时，先生也有宏观研究的论文发表，如对《儒林外史》的四家评本（卧评、黄评、齐评、张评），先生分别写了五篇专论，同时又发表了综论小说评点的文章《重视小说评点的研究，促进小说评点的繁荣》等，这是从“评点”这一领域中体现的。先生还鼓励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研究文学，如为方晓红教授的博士论文《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所写的序言。在为黄强同志《中国古代文人置业志》所作序中，充分肯定其不仅从人文科学，而且还涉及建筑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发表《吴敬梓和科学技术》，从“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的理念出发，探寻《儒林外史》所显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源，与当时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学风以及其亲友从事科学活动的影响有关。

先生在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同时，也强调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在第七届全国古代戏曲会总结发言中，就曾针对会议中提交的论文有许多从文化学视角来研究戏曲而从文学本身讨论戏曲的论文不多见，只有少数几篇将戏曲与小说联

系起来的研讨,而将戏曲与诗、文联系起来的则未曾有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早年曾对一位访问学者谈及八股文与戏曲的关系,世纪之初又对一位博士后谈及吴梅村叙事诗中有许多“移步换景”的手法,这也是戏剧因素。先生在该文中说“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中多样性和单一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共性和个性并存,作为反映这种纷纭繁复的社会生活的诸多的文学样式,同样也存在个性和共性。对文学进行分体研究有利于深入专精,而将诸样式深入进行综合研究则有利于宏观把握。总之,对于文学创作的特性和规律,需要不断分体、不断综合的交替研究方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当然,从文化学的背景来研究文学是需要的,但也应更多地注意就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先生发表的论著中不乏这类文章,如1979年发表的《吴敬梓和戏剧艺术》,1986年发表的《试论杂剧〈女贞观〉和传奇〈玉簪记〉》,1989年发表的《论〈董西厢〉的艺术个性》等,都是将诸种文学形式如笔记、小说、杂剧、传奇、诸宫调等糅合在一起做综合研讨。有的论文也专就同一种样式不同时代的作品探析它们各自特点,如1983年发表的《试论元杂剧对明清杂剧的影响》,以及2004年就《秣陵春》、《桃花扇》、《秣陵秋》三部不同时期的传奇发表了《清代三部以南京为主要场景的传奇》,讨论了三部传奇故国之思的浓淡和地域特色的厚薄等等。

第四,与宏观、微观研究相对应,先生治学又十分注意专精与博通的互通。先生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享誉学界,其成果为同行公认,或誉为海内外第一人,推为巅峰,但先生并不以此自诩,特别是应邀讲学时,除应邀请方指定外,先生自主选题总是回避有关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题目。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生先后应杭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以及香港大学、韩国启明大学、国民大学、高丽大学等校之邀,或讲戏曲,或讲小说,或讲文学史以及文化史、思想史,如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物质文明与人文科学等,大多为吴敬梓研究以外的课题。当然,也有指定讲《儒林外史》的,如南京大学国学讲堂即指定讲此专题。

其实,从研究成果来看,舍弃其影响最大的吴敬梓研究以外,先生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先生对《水浒传》、《后西游记》、《西湖二集》、《歧路灯》、《镜花缘》等作品,以及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如20世纪80年代发表于《文学评论》的关于《后西游记》的论文,被辑入百年以来《西游记》论文选;关于《水浒传》又名《宋元春秋》的考评文字,刊于《水浒争鸣》创刊号;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歧路灯》的文章,辑入《歧路灯论丛》;发表的关于《镜花缘》的文章,收入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手册》,等等。先生还先后被聘为《中国话本大系》和《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整理了《红楼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前两次印刷署名凌嘉霁,第三次印刷署真名)、《西湖二集》(校本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校注本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并与弟子合作整理了《施公全案》,校注了《西湖佳话》等;还指导并与弟子合作,由弟子执笔出版了《章

回小说史》、《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与叙事结构》、《小说与道德理想》等著作。以戏曲而论,先生从李玉与苏州派研究为起始,上推下溯扩大至整个古典戏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即在台北发表《中国传统戏曲简述》,综论古典戏曲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在苏州“中国戏曲论坛”又发表《中国传统戏曲的继承和发展》。此外,从宋金时代以迄明清时期的重要戏曲作品,如董、王《西厢》、郑光祖的杂剧、关汉卿、郑光祖、张养浩的散曲、传奇《牡丹亭》、《玉簪记》、《秣陵春》、《桃花扇》、《秣陵秋》、《息宰河》以及丁耀亢等戏曲作品,都发表了卓有见地的论文,同时还应约以西洋诗剧的形式整理了《桃花扇》。江苏戏曲艺术研究会于1981年4月成立,指定先生等二十五人为第一批会员,并被聘为编纂委员会委员。

先生自中学读书时就喜欢抒情的词与诗,而叙事的戏曲、小说则是先生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所需,但在教授叙事文学之余,先生也不时有关于诗文的文章发表,如《试论杜诗的形象思维》、《从对一首杜诗的评价说起》,并与人合作出版了《杜甫诗选析》。至于词学,70年代初,唐圭璋先生编纂《全金元词》,校领导决定由先生任助手,但接受任务不过月余,即发生变故,先生乃与此项工作脱离关系,但此后江苏古籍出版社编纂《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负责人还征询过先生意见,于1988年5月10日写信给先生说此项工作“能得到您如此热情的支持,真是太令人感动了”,先生并应约,指导50年代在江苏师院任教时的一位学生,并与之合作写了有关陈子龙、宋征舆、柳如是等作家的有关词作。20世纪80年代,先生与吴调公先生奉领导之命,接受研究张岱的罗马大学的终身教授拜尔突乔里的访谈,为此发表了有关张岱的论文。此外,对明代民歌、清人程廷祚、陈古渔的诗作以及古代山水旅游诗词等也作了一些涉猎,偶有文章发表。

先生有些论文还涉及唐以前文学史的内容,如研究吴敬梓的“治经”、讨论吴敬梓接受魏晋六朝思想、文化影响的文章,颇得段熙仲先生的称赞,他所指导的唯一一届汉魏六朝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就诚意邀请先生参加,其中一位硕士后来就随先生攻读博士,早年已晋升教授。还有一位年轻教师要报考先秦魏晋段的博士研究生,当年该系博士点三位指导教师中有二人是以研究唐宋文学为主的,先生则是指导元明清文学的,并无指导先秦两汉的导师,该教师指名要报考先生,并举先生相关论文说明自己报考的理由,现在他也成为该领域的名家了。

先生的研究领域还有一些论及中国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等的文章,如《明嘉靖朝都察院和武定侯为什么要刊刻〈水浒〉》、《武则天以周代唐与儒释道之争的关系》、《儒学核心的“人学”与作为“人学”的文学》、《“太平多暇”与董、王〈西厢〉的产生》、《物质文明、人文科学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兼论和平环境对繁荣艺术的作用》、《南京清凉山文化蕴涵的感受与思考》等。总之,先生虽以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饮誉学界,但无论是先生的教学还是研究,领域都相当宽广。也许正是由于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才能在某一课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专精。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也是要求各自有一

立足点以求专精，然后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如此方能有益于专精。诚如先生在为吴波教授博士论文《〈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序中所言：非专一家无以致精，非兼采众家无以名一家。

第五，先生治学既重视资料考证，又重视理论阐释，注意考证为理论服务，而理论又不分中西古今，强调从实际出发，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择善而从。徐朔方先生在1985年获先生所赠《吴敬梓研究》一书后，认为“长于考证、治学严谨者，或不善于理论，善于理论者或文笔枯涩，读之乏味；工于写作者，下笔千言而根基嫌浅，华而少实”，认为先生所作能“合两美为一，堪为当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成就之一”。徐先生所云可谓的评。为了理清围绕作者身外的问题如家世、生平、交游，解析作者内在的思想认识、学术素养、创作才能等，先生在广泛搜集资料、辨认资料的基础上，一一予以解析，再运用多种理论分析评论作品。

为了更准确地进行考据，必须大量搜集资料。如康熙《全椒志》是先生在70年代首先将其引入吴敬梓研究中的，并在《文献》发表专文介绍；又如陈作霖《金陵通传》中的吴烺小传，也是先生首先披露的。先生还在他人已经检阅过的文献中再次爬梳出他人未曾注意的材料，如陈毅《所知集》等等。不仅是吴敬梓研究如此，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水浒传》曾改名为《宋元春秋》，海内研究《水浒传》者鲜有提及，而是史家邓之诚先生在《清诗纪事初编》中有所披露，但邓书限于体制，既未录出序文全篇，又少有评论，于作者刘子壮的生平、思想也仅略作介绍。70年代初，先生遍阅清初文集，以寻觅吴敬梓生平资料，在清初八股文大家刘子壮的《杞思堂文集》中得见《宋元春秋序》一文，乃行录出，后见1977年出版的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也仅辑录邓著所摘引的数句，未见及全文。先生乃于80年代初应《水浒争鸣》创刊之约，为之撰有《〈宋元春秋〉序略评》一文，既刊出序言全文，又对刘子壮的生平、思想作了详尽的介绍。当然，先生所发现的资料，尤以吴敬梓研究为多，为此先后发表了《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再论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吴敬梓生平文献资料的引用、解读和考辨》、《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等系列论文。

先生发掘资料的目的，在于服务对作家作品的理论阐释。如《吴敬梓的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就是典型的例证。再如戏曲研究方面，以传奇《秣陵秋》为例，关于其作者和创作时代问题，先生经过认真考辨，发表了《稿本〈秣陵秋传奇〉作者和创作时代考辨》一文，对周妙中、庄一拂两先生认定的作者为庄伯鸿、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结论，以大量文献记载与作品本身相比较，层层推解，从而否定此说，这对于评价这部传奇所反映的时代现实，极为有利。此后先生发表《清代三部以南京为主要场景的传奇》，其中对《秣陵秋》的评论，就以其所考证为基准，因而作出了切合实际的评价。

学术研究自然要注意方法，先生十分重视的是章实斋的“知人论世”的主张，不止一次地提及《文史通义·文德》中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以及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所说“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在此前提下，先生主张“法不前定，以笔所止为法”（谭元春《诗归序》）、“法寓于无法之中”（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赞成鲁迅的“拿来主义”，什么方法能阐释清楚问题，能切实反映自己见解，就采用什么方法。无论传统的研治国学的方法，还是由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研究手段如质疑法、比较法、演绎法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不拘一格，用来无不得心应手，而无生搬硬套之嫌。先生特别强调一切从作家、作品这第一存在出发，不要事先于胸中横存什么“理论框架”以之去范围研究对象，即使是传统的“文史互证”的方法，先生也是经常使用的，但又细心地辨别两者区别，在《古籍校勘与古代文学作品解读》文中，指出不可用研究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去范围用形象思维反映纷繁杂复的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二者有可通之处，但仍不能画等号。对这种倾向的文章，先生以循循诱导的方式予以说明，令人信服。

特别是先生运用传统的评点形式解读《儒林外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老出版家徐柏容先生在1990年于南京召开的出版家学术会议上获得江苏古籍出版社给与会者赠送的《新批〈儒林外史〉》后，爱不释手，特地到先生家中相访，并在其专著《书评学》中说：“评点这种方式也渐被人弃而不用了”，“倘若以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审美意识来运用评点方式，它还不失为一种好的、有特色的书评方式”，“这一点，也不是从来无人看到，‘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出版社想出版《水浒》的新评点本，曾印过几回试稿，可惜一直未见其成事。倒是1990年（应为1989年）江苏出版了陈美林的《新批〈儒林外史〉》，但愿这是评点形式书评重新繁荣的一个好的开始。”这说明先生的《新批〈儒林外史〉》是自“五四”以来这一批评形式重新“开始”运作的代表著作。其后，漓江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作家对几种古代小说进行评点，著名作家高晓声将他评点的《三言精华》赠给先生，作为向先生索取《新批〈儒林外史〉》的回报。《清代文学研究》卷中评论《新批》时说“陈美林在研究古人评本的同时，还借鉴这一传统形式，对《儒林外史》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新批’”。该书于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一连再版六次，至今仍畅销不衰，可说是利用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新尝试和新收获”。香港《大公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图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等十余种报刊均发表书评，瑞士学者安如峦、日本学者次藤洋一、韩国学者赵宽熙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有征引，并列为主要参考书，时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辜美高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商伟教授等都购此书多本，以供研究生参考。

《新批〈儒林外史〉》虽获得积极反响，但先生仍不放弃修订工作，尤其是大量的注释未被出版社采用，实属遗憾。先生于是对原先准备好的注释再三加工、充实，并对未及修改的印刷错误予以校改，更名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交由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见书后,《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评论》、《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对外大传播》、《世界》、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十余篇书评。何满子先生在2002年3月2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长篇书评中说该评本是作者“研治《儒林外史》的成绩的综合体现,也是他治学道路和他对小说所关注的方面的生动反映”,对《清批》的夹批和回评做了充分肯定,认为回评“相当于一篇紧凑的论文”,而夹批则“表述评者的世态评论和文化评论”,尤其是对《清批》的校勘、注释十分赞赏,认为其“精善”程度,“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新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尽管获得如此好评,先生仍认为是“阶段性成果”,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又出版了先生再次修订的新版本。由此可见,《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可说是先生利用传统的批评方法诠释经典著作的一个范例,也可见在先生的研究过程中,善于运用多种方法来反映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还表现在一切评论均从创作实际出发,而不从某些权威的观点去牵合成文,如前述《也谈比较文学》一文,即以巴尔扎克、莫泊桑、吴敬梓等著名作家作品中同时存在的“怪吝人”的形象分析出发,得出怪吝成性的人物在不同民族中都存在,不同国度的作家从反映各自现实社会的人物性格出发,塑造了这类人物形象,不一定就是有了甲才有乙。当然,也有可能是甲的出现,带动了乙的产生,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的源泉是人民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此外,在1990年召开的海峡两岸元曲讨论会上,先生提交的论文为《“太平多暇”与董、王〈西厢〉的产生》,从探讨这两部作品具体时代的现实状况出发,得出金元“大环境”不佳,但“小环境”不错,正由于时代“太平”、作家“多暇”方能产生如此杰作。创作如此,学术交流也如此。若不是改革开放,两岸的学者也不可能同坐一起研究学术。当时有个别学者持越是饱乱离方能有杰作产生的观念,自以为是坚持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先生认为要将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创作的具体环境(时间、空间)区别开来,不可混为一谈。近年有关单位召开以中华传统思想与和平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力邀先生参加,并作主题发言,先生乃有《中国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兼论和平环境对繁荣文艺的作用》一文,更全面地阐述了“盛世修书”、“太平编书”等历史经验。以研究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擅长的老专家吴调公先生,对先生的理论功底极为赏识,当年他所指导的两届五名批评史的研究生,均邀请先生参加论文答辩。

三、先生学术研究的启示

从先生的治学中,可以受到多方面的启示。认真研究先生的治学过程与经验,对我们做人治学无疑会有极大的助益。

首先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这表现两方面,一是尊重研究对象的实际,二是尊重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试分述之: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既充分肯定研究对